# 传教士在海南岛

王　禹

This paper focuses on 300 years of western missionary activities on Hainan Island. It examines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missionary activity, the methods of the missionaries and the influence of missionary activiti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although western missionaries were a special detachment of the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invasion of China, from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they did contribute to the advanc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ainan.

早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西方传教士的足迹便已履及海南的三亚和海口等地。三百余年中，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海南的活动断断续续，但近代以来，美、法等资本主义列强依仗不平等条约，深入海南各地，先后上岛的传教士多达数十人，发展教徒成千累万，他们设立教堂20余座，并建立教会居住区，办学校，建医院，一时期海南岛的教会势力颇有声势。

对西方传教士在海南的活动应该怎样评价？史学界迄今鲜有专文论述，本文不揣浅陋，抛砖引玉以求教于大家。

## 一、传教士在海南的历史回顾

明朝末年，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复苏，与澳门遥遥相望的海南岛也成为西方传教士的布道场。明崇祯五年(1632)，澳门耶稣会教士昂德莱·巴尔满伊禄应礼部尚书王宏海之子王保罗(Paul系基督教名)的请求，派澳门传教士马尔凯斯和多明尼加派的曼第司到海南岛传教。马尔凯斯从小生长在日本长崎，父亲是葡萄牙人，母亲是日本人；曼第司则是华嗣传教士。他们二人到达海南岛后，首先给王保罗一家施洗，这是天主教在海南传播之始。两年后(1634)，曼第司因病返回澳门，澳门耶稣教会又派葡萄牙人班诺伊·待·麦脱司到海南传教。时马尔凯斯住在离黎族聚居区不远的定安仙沟，麦脱司住在琼山县府城镇，二人长期在华居住，熟悉汉语汉字，传教经验十分丰富。尤其是麦脱司到海南后，租民房一所作为礼拜堂，积极传播教义，发展教徒，一年后，琼山县入教者已达350余人。

明末清初时期，是天主教在海南传播的一个高峰期，各国传教士不顾当地民众的反对，甘冒风涛之险，相继到海南传经布道。崇祯九年(1636)，传教士将海南分为琼山、定安、仙沟、龙门四个教区，并在每个教区设立教会。到第二年，又有330余名海南人受洗入教。崇祯十三年(1640)，麦脱司在当地民众的反对和驱逐下离开海南。顺治三年(1646)初，不甘失败的麦脱司

欲图卷土重来，他与在安南的传教土路德合伙组织了一个由七名传教士组成的传教团，其中三人是被派往海南岛的，结果在渡海时遇到风暴，只有赴海南的罗培利一人幸免于难，其余六名传教士遇难。同年，由日本乘船到海南岛的耶稣会传教士卡司帕尔特·大·亚马拉尔也惨遭船难。

顺治四年(1647)二月，麦脱司与奴那斯和波兰人米凯尔·波易姆等传教士相继到达海南，在定安、琼山等地大肆活动。到顺治九年(1652)，全岛载之名簿的天主教徒已发展到 2253 名。

入清以来，各国传教士在海南的布道工作与大陆一样，受清廷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影响极大。顺治九年(1652)八月，清军渡海恢复琼州。葡萄牙人麦脱司因受嫌与反清复明的郑成功集团有联系，被清军抓捕投入海中。顺治十七年(1660)，北京发生了明清以来传教史上的第二次大教案。钦天监官杨光先诬告传教士汤若望邪说惑众、潜谋造反，其后汤若望被革职定绞监候。此教案前后历经六年，牵连全国各省，在海南的外国传教士也全部被驱逐。从崇祯五年就到海南传教的马尔凯斯亦在此时死于海盗之手。

康熙皇帝亲政后，汤若望一案得到昭雪，海南的传教事业复见活跃。康熙十二年(1673)以后，在澳门等地避难的外国传教士又纷纷回到海南。但好景不长，1722 年雍正皇帝继位后，清廷又掀起了大规模的禁教运动。海南岛的天主教徒们再次受到迫害，外国传教士先后逃往澳门，许多原来入教的海南教民也纷纷宣布放弃天主。其后，清廷的禁教政策时紧时松，在鸦片战争以前，天主教在海南的传播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法国侵略者通过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取得了在华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及传教之权，接着又强迫清政府同意天主教开禁，掀起了一股勒索还堂的恶潮，各国纷纷援例，先后攫得了这一传教特权。从此，外国传教士和外国商品、鸦片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扩张的一支别动队。

道光二十八年(1848)，天主教罗马教廷将海南岛的传教事务交给了巴黎远东传道会。咸丰二年(1852)，驻广州的法国巴黎远东教会派出三名传教士到海南岛，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西方教会派往海南的第一批传教士，其主要活动地点在文昌县的昌造、定安县的深水田和琼山县府城镇等地。据史料记载，巴黎远东传教会在海南活动二十余年，先后发展教徒 840 余人。

咸丰六年(1856)一月，法国传教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胡作非为，被清朝地方官处死。同年九月，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马赖一案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八年(1858)五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两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其中规定了开放琼州(今海口市)为通商口岸，并允许英、法等国家在海南岛设立领事馆。从此，大批西方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和大炮为后盾，再次涌进海南。同治六年(1867)，法国侵略者霸占了越南南部六省后，其侵略矛头逐步转向越南北部和中国的南部边疆，海南岛亦成为法国垂涎的目标。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腐败的清政府在法国的压迫下，作出了海南岛不割让与他国的声明，将海南全岛划入了法国的势力范围，于是受法国政府保护的天主教传教势力在海南的活动愈加有恃无恐。

先是，光绪二年(1876)，罗马教廷将巴黎远东传道会在海南的传教士全部撤回，海南的传教事务改由澳门葡萄牙传教会派出的四名传教士管理，其活动区域仍主要在汉族聚居区的文昌、定安和琼山等县。

宣统元年(1909)，法国安南东京传教会呈准罗马传信部，将海南传教区域划归广州主教管辖。同时，法国巴黎双圣心会又相继派遣九名传教士到海南岛，他们深入各地，先后建立教堂

16 座，并在琼山府城镇设立孤儿院（后迁至定安县鹅万村），在海口市设立中法医院、圣保罗育婴堂和天门小学等。

民国十四年（1925），海南天主教改由北海主教区管辖。到民国十八年（1929），法国耶稣会派遣宋礼钧神甫到海口后，海南岛又变为独立教区，直接受罗马教廷指挥。

在天主教加紧在海南活动的同时，基督新教势力亦不甘落后。清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美籍丹麦人冶基善从广州抵达海南岛，开始进行传教活动，这是基督教在海南传播之始。冶基善在同治年间就已留居中国，曾任广东地方当局缉私舰的指挥，以后又在清廷海关任职，退职后作为一个“独立的传教士”（independent missionary，指不属于任何教会的传教士）开始在台湾传教。光绪五年（1879），他到广州在美国长老会办的广州医院接受医务训练。冶基善到海南后，先在琼山县府城镇文庄路的吴氏宗祠内设立传教场所，定名为“中华基督教琼海区会”，属美国长老会领导。接着，光绪九年（1883），冶基善又在海口设立传教总部。其后，光绪十年（1884），他在儋县那大镇租了一间商店作为教堂，开始在客家人地区传教。光绪十一年（1885），广州美国长老会派遣牧师康兴利到海南协助冶基善传教。作为传教的手段和场所，康兴利等人先后在海口和那大、加积等地建立了福音医院和福音堂。光绪十三年（1887），美国长老会又派遣张约逊、王约翰、纪路文、吴顿安、徐君礼、郝斐等传教士来到海南，并成立了长老会海南教区。他们先在琼山县府城镇北宫街租一套民房作为传教的场地。光绪十六年（1890），他们在租用民房的后面建起一座楼房，作为纪路文和张约逊的住宅，同时在附近建一座楼房作为中西女学堂之用。光绪十九年（1893），纪、张、康等人离开海南回国。美国长老会又派谢大辟接替纪路文在琼山县府城基督教堂任牧师；派悟熙国接替张约逊在海口福音堂任牧师；派陈西美接替康兴利在海口医院任医师。第二年，纪、张、康三人再次来到海南，他们在琼山府城镇原租的民房西边再建楼房一座，作为中西女学堂的校舍，由周罗以为女学堂的负责人兼传教士。将原有的中西女学堂校舍改为中西男学堂，由张约逊兼任男学堂的负责人。同时，纪路文、谢大辟、张约逊、悟熙国、郝斐和徐君礼等传教士分别到岛内各县进行传教活动。

也就在此时，最先将基督教传进海南的丹麦人冶基善脱离了美国长老会，独自到海南崖州府的勒罗村（今乐东县九所附近）建立了传教总部，与其妻一起深入黎区进行传教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中国北方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南方各省的教案也此起彼伏，美国长老会急忙将海南的传教士撤退至澳门等地。数月后，美国长老会见海南形势平静，又派遣数名传教士返回岛上，在黎汉各族人民中间进行布道活动。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美国长老会已在加积镇的北门外购买了大片的地产，建筑起教会住宅区。至此，从光绪十六年（1890）海南第一座基督教教会住宅区在那大建成后，美国长老会已先后在那大、海口、府城镇和加积等地建立了教会住宅区，成为基督教长老会在海南传教的大本营。

与台湾岛不同，海南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没有遭到过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进攻，帝国主义列强对海南的侵略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的掠夺和宗教文化上的渗透。在宗教方面，西方教会势力之所以在海南发展得如此迅速，一方面是西方传教士们以列强的炮舰为后盾，以中外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另一方面是得到了腐朽媚外的清朝地方政府（其后是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近代海南名人王国宪先生在重修琼山学校的纪文中曾尖锐地指出：“慨自咸同以来，约许洋人互市，有传教保教之条，而洋人西教之入琼遂显，与圣教（即儒教）树之敌。入西教者，凭藉势力报复寻仇，则激成教案。而官不为持平，执公法以争之，屈民伸教。”[①]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和清朝地方官吏的腐败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光绪十一年(1885)冬,临高、儋县一带遭受大旱饥荒,客家人黄邹强等人聚众起义,万州、陵水等地的黎、汉各族人民积极响应。起义军一度曾攻下定安县的南间、仙沟、雷鸣和澄迈县的新吴市,迫近定安、澄迈两县城。清王朝大为震动,两广总督张之洞急忙电令钦廉提督冯子材率兵渡海镇压。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清军因不服水土多染瘴病,伤亡惨重。此时,正在那大等地传教的冶基善、康兴利等人积极为染病的清军送药治疗,受到清军的普遍欢迎。事后,光绪十四年(1888),海南地方政府赠送那大一块土地给冶基善作为修建教堂之用,以酬答传教士为协助镇压农民起义的“功劳”。②

## 二、近代传教士在海南的传教特点及其手段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已与明末清初的西方“布道者”截然不同。为了迅速扩张海外市场,掠夺和奴役落后地区的国家和人民,资本主义列强都把宗教作为他们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先遣军和别动队。在近代帝国主义的侵华史上,鸦片、大炮和传教士已明显地成为列强掠夺中国人民的三位一体的工具。在列强侵华政策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西方传教士在海南的活动也呈现出如下的特点:

(1)随着不平等条约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列强侵华政策的日益升级,涌入海南岛的外国传教士逐年增多。其中不仅有以法国为主的巴黎天主教各派,而且也有以美国为首的北美长老会教派。据有关资料统计,从咸丰元年(1851)到民国十二年(1923),法国巴黎教会和澳门耶稣会先后派遣传教士 16 人,并利用传教特权深入海南各县建立教堂和分教堂 16 座,发展教徒逾千人。③从光绪七年(1881)至海南解放前夕,基督教美国长老会派往海南的传教士先后共有 50 余人,设立基督教海南大会及其分会 41 个,教堂 14 座,发展教徒近万人。④

(2)与近代海南经济与文化的开发同步,西方传教士的活动逐步深入黎区。随着资本主义侵华势力从沿海深入到京师;从中原扩展到腹地边疆,在海南的外国传教士也逐步从汉族聚居区的琼山、文昌和海口等地向黎人聚居较多的那大、加积等地发展,最后深入黎族聚居集中的崖州、保亭等地,用各种手段在黎、苗等少数民族中间发展教会势力。如光绪七年,美籍传教士首次将基督教传入海南后,先在琼山县府城镇和儋县那大镇立足,在海口设立传教总部,然后深入黎区到崖州勒罗村建堂传教。冶基善死后,美国长老会亦以那大和加积两镇为据点派遣传教士深入黎峒、苗村大肆进行传教活动。

(3)外国传教士主要以医疗和办学为手段在广大汉区和黎、苗少数民族聚居区发展教会势力。在近现代海南岛的传教史上,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方式主要以开医院、办学校为主,尤其是基督新教在这方面更为明显。如光绪十三年(1887),美国长老会在琼山府城镇建立了中西女学堂之后,光绪二十年(1894),又在府城建立了中西男学堂。其后,光绪三十年(1904)和民国二年(1913),长老会又在加积镇创办了男校和女校。民国五年(1916),黎族首领王义兄弟保送黎族男女青年十余人到加积美国教会所办的学校就读。不久,教会又派一名教师前往黎族聚居区的保亭设立了一所简易小学,借此在汉黎群众中发展教徒。另外,宣统元年(1909),苗族首领陈日光因面部被熊抓伤,至加积美国教会医院求医,结果在治疗的过程中接受了基督教教义的灌输。数年后,陈日光请求美国长老会派人到苗族村寨传教,到 1919 年,海南已有 12 个苗村建立了礼拜堂,24 名苗人接受洗礼入教。⑤

(4)在汉黎冲突的传统环境中,海南民教矛盾不甚明显。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外国传教

士依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以教堂为堡垒，以教徒为臣民，横行乡里，霸占一方，成为在殖民统治者“保护之下广泛散布在中国各地的独立王国”，[6]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鸦片战争以来，全国各地的教案层出不穷，据《中国教案史》一书统计，自鸦片战争后的1844年至五四运动前的1916年，包括台湾和西藏在内的全国各地共发生教案及民教冲突537起，其中台湾岛内共发生民教冲突16起。[7]而查阅史料，海南岛不仅近代，而且在海南解放以前的300余年中并没有发生一起明显的教案事例。究其原委，并非是在海南布道的外国传教士能够循规蹈矩，慈悲为怀，而主要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所形成的汉黎矛盾掩盖和转移了海南岛的民教冲突。如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897—1899)，崖州爆发的海南岛史上规模最大的多港峒黎族人民大起义，原本是由民教冲突引发的，但很快就由积怨甚深的汉黎矛盾发展为一场反封建的黎族人民武装斗争。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美籍传教士冶基善设教堂于崖州勒罗村。村里教民陈庆昌(又名陈世典，汉族商人)平日倚仗传教士的威势横行霸道，并放高利贷，欺压黎族百姓，黎人稍有拖欠即拉牛抢东西，黎人对其恨之入骨。一日，陈庆昌跑到抱赖村催债，欠债黎人哀求放宽数日，并杀鸡置酒款待他，但陈蛮横地要拉走黎人唯一的一条耕牛抵债，黎人走投无路，趁其酒醉时杀掉了他。事情发生后，崖州基督教会趁机告状，向清朝地方当局施加压力，崖州府急忙下令乐安城千总何秉钺限期破案。何秉钺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抓人，把正在田里干活的黎族农民李亚发的妹妹抓去，关在乐安城的牢房里作人质。这一暴行激起全峒黎族农民的极大愤怒，于是在黎人吕阿够的领导下，一场反对清朝地方封建统治的黎人大起义爆发了。

## 三、西方传教士在近代海南开发中的影响

海南岛虽早在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即已设郡立县，但历代封建统治者均采取了消极的治琼政策，他们或“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或以剿为主，大张攻伐；甚至隔岸遥领，弃之不治。直到清代，封建统治者依然是采取“议安抚之策，严守御之方，令相安无事”的消极政策。故千百年来，海南开发的历史进程十分缓慢。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光绪时期海南岛的开发史才翻开了新的一页。其中，外国的教会势力在其传播宗教的过程中，也充当了海南社会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主要表现在兴办西学培养近代化人才和开设医院促进海南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两个方面。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光绪十三年(1887)于琼山府城创办第一所教会学校以来，先后在海口、那大、加积等地建立多所教会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成为传教士们向海南传播近代科技文化的“洋学堂”，而且也培养出一批海南近现代的优秀人才。如海南医院的创始人之一，首任院长朱润深(1894—1957)先生早年丧母，家境贫寒，靠祖父朱守京抚养，读不起书。后由基督教传教士介绍到加积镇教会学校(觉民学校)当工读生。因读书用功，得到教会赏识，被送到杭州之江大学就读，两年后转到湖南湘雅医学院学医。医学院毕业后参加美国耶鲁大学考试，获医学博士学位。是海南历史上最早获此高学位的专家学者。[8]

另外，海南大学的创始人之一，首任校长颜任光先生亦是童年家贫，由教会培养资送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电学，荣获博士学位。回国后颜先生历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上海光华大学校长、圣约翰大学教授等职。海大创办后，他毅然放弃优裕的职业，应聘回乡从事高等教育的拓荒工作。[9]

外国教会学校不仅为海南培养出许多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和医学家，而且亦将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到五指山上的黎族青年中，客观上促进了海南黎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如前面提到的民国五年(1916)，黎族首领保送黎族男女青年十数人至加积镇美国教会所办的学校就读。其后，美国长老会又在黎人聚居的保亭等地设立了三、四所简易小学。其中"以陵水属保亭营附近南春弓所设者为最著。办事之人名潘新和，系美国学校毕业之学生，道德纯粹，和蔼可亲，有志化黎，不求厚俸，每年由教会领款三百元作为常年经费，经营布置大费苦心，诚足令人钦佩也！"[⑩]另据彭程万、殷汝骊二人实地考察后所撰写的《琼崖黎民之状况及其风俗与教育》一文中记载：进入府城和加积、那大等地美国教会学校学习的黎族男女青年，"男生免学膳宿费，女生则衣服、书籍、笔墨均由学校供给。各生成绩甚佳，英文已能上口，所作英文信札，书法清秀，尤足令人赞赏也。"[⑪]以至民国期间，许多有识之士在大力提倡振兴黎人教育的论说中，也多次提到要仿效美国教会学校深入黎区办学兴教的经验。

在医学方面，海南岛直到明代仍是官府有医而民无医，"民疾病但求巫祝"，"病不饮药，惟杀牛祭鬼"。[⑫]乾隆元年(1736)，清朝水师副将苏福倡率士商捐款，在海口城内马房坊(今居仁坊)建造产婴堂，为海南历史上的第一所医院。[⑬]其后，光绪十一年(1885)，地方豪绅禀请道、镇、府县立案，在海口创建了惠爱医局，由各商董担负医药费，并劝募集资。也就在同一年，美国长老会派遣康兴利在海口盐灶村建立起福音医院(即今海南人民医院的旧院址)，这是西医传进海南岛之始。接着，康兴利等人还到琼东的加积镇和儋县的那大镇分别建立起福音医院和福音堂。当时海口的福音医院发展较快，规模亦大，设有各科门诊和留医部，病床约六十张左右，医护和勤杂人员四十多人，还办一个护士班，全由美国人主持。

在基督教将西医传入海南岛之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法国天主教亦在海口得胜沙建立了中法医院。

显而易见，外国传教士虽是以开办医院为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场所和手段，但他们在布道的同时，也促进了近代科学与先进医疗技术的输入与传播，对改变海南人民，尤其是黎苗等少数民族信巫不信药，"以巫为医，以牛为药"的旧风俗，更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综上所述，西方传教士在海南三百余年的传教史中，有低谷，也有高潮。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列强侵华的先遣军和别动队，传教士在海南的一系列活动，既有其卑劣、肮脏的一幕，同时，在其布道过程中，亦不自觉地成为近现代海南社会发展的工具，他们在客观上对海南近代开发的影响和促进，是不能忽略的。

---

①《海口文史资料》，第二辑，《王国宪先生传略》。

②⑤刘耀荃编：《黎族历史纪年辑要》，第102页；第106—107页。

③《海口文史资料》，第一辑，第104页；陈植编著：《海南岛新志》，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第135页。

④韦经照：《基督教在海南岛的传播》，《海南大学学报》。

⑥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1929年美文版，第279页。

⑦此数字根据张力等著《中国教案史》附录简表作成。

⑧《海口文史资料》，第三辑，第169页。

⑨⑭《海口文史资料》，第二辑，第32—33页；第65—66页。

⑩⑪彭程万、殷汝骊：《琼崖黎民之状况及其风俗与教育》，载《地学杂志》，1922年第11期。

⑫(正德)《琼台志》。

⑬《琼山县志》卷5。